



大鳳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无后

／ 李一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无后』

——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现象研究

李一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后”：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现象研究 / 李一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1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7-5378-5039-1

I. ①无…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5127号

书名：“无后”

——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现象研究

著者：李一

责任编辑：高海霞

书籍设计：张永文

印装监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字数：232千字 印张：15.5

版次：2017年1月第1版

印次：2017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039-1

定价：36.00元

火鳳凰

巴金

前言

199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逐渐形成一个多元的文化格局，人们一边感受着多元所带来的自由，一边又为这新的自由所带来的平庸暗自惶惑。在这一时期，文学吸收并消化了充裕在1980年代的观念和激情之后，尝试着多种角度和方式探讨、分析当时人们的社会心理，众声喧哗。也就在这样一个多元的格局中，文学越来越边缘。世纪之交，技术在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开辟了一个真正的人类新纪元，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人们对世界的想象与认知都在这个新纪元中翻开了全新的一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文学的表现力和影响力集中成为文学者思考和讨论的话题。

传统和现代真正成为新世纪文学内在的区分。大量的为我们所熟悉的延续自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意趣旨意的作品，事实上在这一新的纪元中，以小说为代表，仍然向自17世纪以来的现代小说传统致敬。而同时另一些创作以科幻小说为代表，作家们不再将关注的兴趣放在人与人的具体关系上，而是开始想象作为一个类的存在人的抽象的处境。人与人具体的关系是自17世纪以来小说所表现的主题，几乎我们对人和世界所有的想象与理解都是通过具体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得以呈现。在四百年左右的书写历史中，人与人的关系附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完成了经典化的呈现。而将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加以想象，想象人类与可能存在的外太空的关系，使得人与人的具体关系以及人性、人类历史等等问题获得了某种想象角度。相比较而言，就对人世的切入

角度来说，前一种创作可以理解为传统的小说写作，后一种则是现代的、科技化的新的小说。

在19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背景中，小说除了共享西方现代小说的审美和兴趣外，还有另一种独特的与我们现代性语境相关的先锋性传统。“五四”新文学从文学演进的河流中截出一条支流，它背负知识分子的现代家国梦想，成为新历史中的知识分子的道场。先锋性的传统和知识分子的道场在世纪之交的文化格局中逐渐分散、边缘，它们在小说的这一新历史纪元里再一次聚集起来，华山论剑。

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

“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

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对，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

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的。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生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郜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

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我零星读过李一博士的论文，注意到她命名和分析“新世纪文学”文本中的“无后”问题。李一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苏州大学文学院工作，我们成为同事，因此有了比较多的学术交流机会。我常常听到她对一些作家作品的独到解读，思路之清晰，表达之干练，观点之新颖，给我不少启发。这样的特点也反映在李一的教学工作中，她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在李一的著作《“无后”——新世纪文学中的一个现象研究》付梓之前，细读了这部书稿，对她研究“无后”现象及相关问题的思路、方法、内容和观点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以为是研究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成果。

对“文革”结束后文学阶段的命名，现在已经很少使用“新时期”这样的概念，依次分为“八十年代文学”“九十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现在我们还不能充分地认为这些命名已经历史化了，对这几个阶段的表述也只是当下研究界约定俗成的初步共识。包括李一研究的“新世纪文学”，也还不是一个历史概念。“八十年代文学”的历史意义已经被充分认识，但1980年代文学延续下来的问题仍然未解，我一直认为1980年代是“未完成”的年代。“九十年代文学”在文学批评或者文学史论述中几乎是“不幸”的，它收到“八十年代文学”的压迫，很快又过渡到“新世纪”。其实，1980年代成名作家的重要作品大多完成于“九十年代”。因此，单一而非关联的研究，不仅无法解决

阶段性的问题，更无法对近三十年的文学做出整体的把握。我提出应当通过“关联性”研究，梳理文学史一些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与此相关，从什么角度或者层面进入文学史的内部至关重要，具体为研究者发现、命名和揭示问题的能力以及阐释问题的有效性（不能津津乐道于“伪问题”）。——我在这样的思路中看待李一关于“新世纪文学”“无后”现象的研究。

关于“新世纪文学”的研究，可谓众声喧哗。李一如果没有自己的路径进入“新世纪”，那么她的所有论述只可能是对一些问题的重复阐释，在这一点上她是清醒的。在追踪研究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文学时，发现了“无后”这一现象。“无后”是一个针对作品中集中涌现的某种相似性情节设定逐渐概括出来的，带有比拟性质的后发的描述概念。长久地跟踪式阅读使李一发现，在一些1980年代文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笔下，这一时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某种相似性的书写：这类小说中通过各类“父子”血缘、家族伦理故事框架，想象着一种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青春象征”中二元对立的新的“断裂”式情节虚构。而更为年轻的作家，又以另外的方式回应1980年代成名作家对“无后”的书写。李一对“无后”的界定，实际上已经隐含了她分析这一现象的框架，在和20世纪上半期文学史的关联中讨论新世纪的“无后”问题。

李一集中关注两个方面。其一，到底是谁的“无后”？她认为“无后”面对的是未来的问题，涉及实指与虚指，它有具体的实指，更有精神方面的虚指。李一的解释是，作为实指即生命没有后代，仅此而已，只不过一个事实；虚指则包括实指带来的一系列个人精神问题，以及由此可以升华、象征的文化遗产的担忧。在李一的研究中，“无后”的重点是由实而虚。其二，当下的“无后”关涉历史与未来。在讨论“未来”的焦虑时，“无后”势必还意味在某种潜在的对于“过去”的思索。只有在“未来”与“过去”的双重意义上，“无后”的精神虚指才具有存在的合理语境。李一的这一理解，同时还包含了她试图采用的研究方法。

在李一看来，“无后”这一现象从它生成的语境来看，“无后”

首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兴趣，它所涉及的所有小说都建立在某种关于历史的叙述之上。李一对《少年中国说》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梁启超文中并举呈现的“老”“少”的二元对立结构，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观世方法中那条自然生命链条打断，而且否定了生命链条之一环一环的历史连续性中所蕴含的自然历史生命能量的接续和传递，它实践的是一种来自现代视角的“断裂”的观照方式。由此引发晚清之关于“少年”的“历史想象”，晚清——民国之时的“现代民族想象”。李一将现代文学中以“对立”为基本模式的“父子”书写，视为上述“断裂”的反映。她认为20世纪上半期的现代文学出现了两种“父子”书写：一种为讲求家族连续的、并无特殊历史思想寓意的情感性书写，它意在表达着某种真实动人的普通的自然情感；另外一种则是从《少年中国说》到“青年”而后所诞生的某种现代性虚构，它以“父子”隐喻着新旧二元，通过情状化二元对立，进而表现有关现代家国未来的想象和时代的风貌。李一分析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条来自自然血脉的‘生命链’文化被‘现代’所打破，一并被破坏的还有这条‘生命链’所代表的超稳定的文化结构，由是文学中才抽象出来的以‘父子’代表二元文化的对立，以至生成超越稳定文化结构之外的一个带有断裂性的‘父子’文化书写结构。”对20世纪上半期“父子”书写文化结构的历史阐释，构成了李一讨论“新世纪文学”之“无后”现象的基本参照，而“青春象征”则是李一考察“新世纪”文学“无后”现象的最重要维度。

李一想要叙述的这一历史无疑是“宏大”的，但如何处理是困难的。她显然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将论述集中在人物关系的转化方面，由此透视历史的沉浮。她对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父子”关系都做了简要的分析。五十年代是“青春象征”书写最为淋漓尽致时期，“革命”成为考察“父子”书写结构的关键词，而“父”与“子”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内涵。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则是“青春象征”极端发展的年代，“文革”结束后乐观主义的“青春象征”终于因青年生命自带的鲁莽、幼稚和冲动而被批判，最终被取消。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因为“后”在“父子”结构中的“革命”性的变化，“无后”这一概念也就呼之欲出。李一思考的问题是：

在此乐观的“青春象征”被取消之后，被复合了两种中国现代文学书写上的“父子”观照（即连续的和断裂的）为何却继续在那条连续的血脉生命链条上，出现“父子”之维的“无后”呢？如果这是一次新的“断裂”，那么差异何在？李一的回答是：

在一些1980年代文坛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笔下，这一时期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某种相似性的书写：这类小说中通过各类“父子”血缘、家族伦理故事框架，想象着一种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青春象征”中二元对立的新的“断裂”式情节虚构。有意味的是，这一代作家正好是已落幕的、具有强烈的“青年象征”性的“青春文学”中的最后一代，他们在终结了1980年代文学中的青春性后，集体开创了1990年代更为多元、平稳和丰富的又一个文学历史时期。他们假借的文学情节模式同为现代文学中常用的“父子”家族血缘传递故事。他们所着重表达的同样是一种“断裂”。不同的是，在20世纪上半期以青年象征社会希望的这种写作潮流中，“断裂”具有理想性和革命性，它是一种主观的愿望，即打破旧的世界秩序开创新的美好的现代文明社会，是用一种家族书写隐喻社会理想的方式。而此时的这些作品中，作者在与历史相似的情节模式中，颠倒了情感的着意点，原本的“儿子”视角变成了作者对“父”所代表传统的、历史的、延续的叹惋，同时原来文学中主观的断裂隐喻如“儿子出走”在这里变为通过书写血脉传递的一种“无后”的境遇，表达作者对于某种历史延续性的集体性焦虑。

这样的论述中，自然还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在这样的历史转换之中，小说家的世界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影响到他们对“父子”关系的认识；在意识形态影响之外，小说观念的变化是否是再次“断裂”的一个原因；这样的转换是否表明当代中国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巨变，等等。

李一对“无后”现象的历史论述建立在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基础之上，她不是从概念出发确立“父与子”“老年与少年”的紧张关系，而是从文本内部的结构中阐释这样一种紧张关系的形成，这使她避免了大而无当的论述。当“无后”成为一种分析视角时，李一对不少作家作品有可圈可点的解读。李一认为贾平凹《秦腔》中所谓的“无

后”，即小说创造了一个类似怪婴等表示生命承继出现问题的意象，并以此生成对某种文化、理想、现实的焦虑、恐惧、绝望之感。“由此，没有肛门的婴儿作为一个文学意象，它在文本中或可视为对文化和乡土未来命运的一种隐喻。”清风街上这一代里最优秀的一对男女生出了一个没有肛门的婴儿，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上一代人则逐一告别生命、退出历史，清风街的整体性的衰败不可避免。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某种意义上是所有人的生命能量最后羽化而成的硕果，但是他的家族似乎所有人都比他对历史有力量。结果是，上官金童送走了所有的人，他的生命能量得以了被动的保全，而后走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李一认为：“小说的真正的隐喻意义在这里，即在结果，而非过程。但难题在于，‘结果’仍然是空白的，充满了想象的空间。这是莫言在对历史观照中出现的‘无后’意象。”对一段时间颇有争议的《上海宝贝》，李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一认为“青春文学”的核心是如何处理青春期能量的闲置，这就对199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宝贝》提出了挑战：“《上海宝贝》之前，几乎所有涉及青春期性苦闷的作品，都可以瞬间将这种生理性的苦闷转嫁于精神上，且精神上有所投靠，有所解决和升华，如1920年代郁达夫的作品和1980年代张贤亮作品。可历史到了20世纪末，青春没有了依托，它重新成为基因突变中被严密筛查的对象，所以在性的问题上，小说必须对此时‘无用’又‘旺盛’的性做出处理。《上海宝贝》在这个问题上，呈现了一代青年无名的焦虑。”这是一种学理的而非道德的评论。

这本书也是李一自己内心的独白，即便不是“精神自叙传”。从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关联看，“无后”或许是更为普遍的现实问题，不管是李一这一代，还是我们，都在遭遇“无后”和相关问题的困扰。置身小说文本和文化现实中的李一，在文化谱系上无疑暂时处于“子”的位置，她和历史、文本构成了对话关系。当她把“无后”也解释为精神方面的虚指（实指带来的一系列个人精神问题，以及由此可以升华、象征的文化遗产的担忧）时，她自己其实也是小说文本中的一个人物，她对所有问题的追问实际上成为她个人与历史、现实对

话的一部分，并且呈现了她自身的精神处境。李一对“无后”现象的历史追问，在有意无意中梳理了自己的思想资源，表明了她对历史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还不具备复杂性，但能够衔接历史不仅从一个侧面打通了文学史阶段之间联系，而且也让自己处于“有根”状态。李一分析此时的历史语境时，发现了我们的真正处境是：“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思想’的多元，而是某种经济生活所刺激的单一物欲对于整个社会语境的冲击和挤压。‘无后’的意思与其说是‘多元’，不如说是‘未明’。”她把当下的文化现实表达为“未明”，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保持了距离。

在观察这一问题时，我特别在意的是，在对文化现实的认识基本相同的情形下，李一如何解读和她年龄相仿的这一代作家的作品。正像她所意识到的，与这个传统断裂真正休戚相关的是以被称为80后为主体的一代人。因而，她对这些年轻作家的解读，也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上一代作家对“无后”的焦虑。李一对“无父”和“孤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理解这“陌生的一代”提供了启示。在分析了张悦然短篇小说《一千零一个夜晚》的叶澎后，李一比较了张悦然与上一代作家的不同：“这显然是在另一种书写中回应贾平凹等‘无后’的精神隐喻。在莫言笔下，人人那澎湃的生殖欲望和生殖能力，在这里，都已消耗、退化。张悦然的这些作品从对历史的焦虑到历史寻找的失望，而后在‘无父’这个开始只是小说人物情感上的某种预设，发展为确确实实精神上的无所依靠。由此‘无父’必然导致‘无后’，甚或说，在‘无父’的精神中，‘后’已经不具备讨论的前提，因为在父与子之间的‘我’的自然生理功能没有了精神的关照，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自我萎缩和自我退化。”当李一揭示了“无父”这一现象时，她残酷地说白了文化现实中几代人的精神状态。

李一对郭敬明《小时代》三部曲的分析直接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处境”相关联，“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终于在拉长的篇幅中，为我们这代人看似没来由的孤独做了历史的注解。”李一注意到，早在《小时代》之前，这种情感状态实际上已经被张悦然、笛安等人开始触碰，只是它始终以一种莫名的面貌作为主人公的身份存

在，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都没有足够的体量来真正地围绕这种情感处境有兴趣地呈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很多以青春为视角的年轻作家，对于这种孤独本身的玩味，它既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同时也没有被放置在历史与时代中得到追问，所以这类作品中弥漫着莫名的惆怅。这种情况的产生“除了与写作者没有足够的思考和认识笔下这种实际上是此时我们这一代特有的孤单有关，还与整个现代小说在20世纪以来从具体的个人转向抽象的个体这一潮流有关，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大历史潮流下，年轻的写作者才急于在自我一代身上寻找人类和人性的书写意义，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代人对于时代的兴趣严重缩水。”李一于是能够贴着这一代人与时代的真实关系解读《小时代》的意义：

“在几个年轻男女的友情、爱情书写中，不自觉地写出了真正困扰在这一代写作者笔下的孤独情感。这种孤独带给一代人的敏感、极端、胆怯才是郭敬明小说中关于友谊和爱情的真正诠释。它也许改变不了我们这代人‘陌生’的面目，但有可能让我们自己彼此看见。”这样的理解，并不反对一些人对“大时代”的执着，但说明了“小时代”为何存在又怎样存在。历史在延续中断裂，断裂又成为关涉未来的一种方式。在这样的脉络中，我们都可能会产生自己的焦虑、孤独和无助。“无后”的情绪也许还会弥漫，现实也许更加“未明”，如何才能彼此看见，已非一代人的问题。——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对话。在现在的学术秩序中，年轻一代学者的声音常常会被淹没，或者被轻视。或许因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我也不免对一些事物持有悲观情绪，但在李一和他们这一代青年学人的文章中，我读到了她和他们对文学与世界的理解，读到了与我们这一代学人不一样的气息。

王尧